

# 復古，維新，革政——劉師培 《周末學術史序》述論

余一泓

海南大學人文學院

近人劉師培以博通四部、持論有本著稱，也有趨新求異、好名無恆之公共形象。他在1905年開始公布的《周末學術史序》諸論，是當時以新知疏通舊學的前沿之作。在回顧相關先行研究之後，此文首先分析《周末學術史序》徵實、民主和崇古之思想寄託，呈現其中未予明示之連貫理路。隨後，此文側重觀察該組文本中所出現的同時代學者之觀點，以及應時而生的經典文獻新解讀，探索劉氏崇古以革新的論學旨趣所在的具體語境狀況。因劉氏本人思想和外在風潮都在幾年以後快速地發展、裂變，故此文更舉出劉師培和其他學人之後的言說，以對照《周末學術史序》所面臨的新、舊分途之困境。此文判斷劉氏諸論為當時趨新儒學的最後高潮之一。

**關鍵詞：**清季新學 劉師培 諸子學 文化保守派

## 一、引論

儀徵劉師培（1884–1919）是清季民初時期有數的儒家學者，同時也是以趨新好變、為時轉移<sup>1</sup>著稱的文士兼政論人。在他遺世的諸多已刊、未刊文字中，《周末學術史序》的影響未必最大，價值必不最高，<sup>2</sup>但確有開風之意義。作為對舊學「始條理」的先驅研究，《學術史序》是整理國故的前奏。<sup>3</sup>憑藉對西來新學分科之法的認識，劉師培做了不少有舊學積累的學人想做而未做之事，因而成名。<sup>4</sup>《學術史序》刊於《國粹學報》1905年首期，連載至於第五期。在劉氏的時間表裡面，此前有《中國民約精義》之作，此後更有大量述論學術史的文章以及《教科書》多種問世。<sup>5</sup>1905年初的劉師培，是「離家出走」<sup>6</sup>來滬不過三年、及冠未有兩年的年輕書生，而《周末學術史序》，恰好是這位天才擁抱新潮的開始。

限於接觸新學的時間較短，《周末學術史序》和《中國民約精

- 1 此特徵的最新研究可參張仲民：〈「以學殉時」：洪憲帝制期間的劉師培〉，《史林》2019年第2期，頁100–114。
- 2 在劉氏自己看來，最有可傳之望的研究當是民國初入川後（1911）用力最多的三《禮》類著作，參葉國良：〈劉師培《禮經舊說》的寫作宗旨及其詮釋上的問題〉（《臺大中文學報》第31期〔2009年〕，頁243–268）之介紹。
- 3 錢玄同（1887–1939）是《國粹學報》的讀者，後來也對劉氏的學問十分景仰。我們找不到他對於《周末學術史序》的具體看法，但是可以參考他1925年5月10日對於胡適（1891–1962）整理國故，寫作系列《中國某某史》計劃的評論，參〈致胡適〉，收入劉思源主編：《錢玄同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六卷，頁115。胡適自己研究諸子學的初心包括「尋找合適的土壤，以植入西方哲學與科學的至佳產物」。（“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5卷，頁316。）這跟《周末學術史序》當然有可比性。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研究最後會說明劉師培的著述與其說是整理國故，不如說是疏通國故，詳後文。
- 4 例見黎錦熙（1890–1978）的感受，參李孝遷：〈《周末學術史序》：中國第一部以「學術史」命名的著作〉，《華夏文化》2001年第3期，頁49–51。
- 5 參見陳奇：《劉師培年譜長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頁121–181。此後的兩漢學術發微諸論，《古政原論》等作，在材料、思路上對《學術史序》有推擴（上推三代、下推漢宋）之效，這是研究劉師培整體思想變化的工作，此不贅言。
- 6 參見楊麗娟：〈揚州新見劉師培早期生平史料考略——以劉葆儒《三叔廿歲前「形勢」》一文為考察中心〉，《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頁77–83。

義》一樣，拿來主義色彩濃厚。但那本身也是一個中國「新化」尚待深入的時代，到處都是有待新化的空白。論者已發現，《學術史序》不光是接受新學名詞，在某些方面還有首創之功，例如「文字學」。<sup>7</sup> 故更多研究劉師培的學者都注意到《學術史序》，將之作為由西學新知整理諸子學的先鋒作品，尤重其越出考證藩籬、發揮諸子義理的特質。<sup>8</sup> 其時如孫德謙（1869–1935）、張爾田（1874–1945）者亦講諸子義理之學，但他們更多是內在於舊學語境中的「新」，而非相應於西方分科之學之新。<sup>9</sup> 在劉氏所用新的論學形式的背後，是他激進趨新之政治文化立場。<sup>10</sup>

當時的新詞彙「論理」指的是「邏輯」，然而大劉師培一歲，當時同為激進青年的馬一浮（1883–1967）在抱怨湯壽潛（1856–1917）無法理解其激進言論的時候，卻說他的勸告「不合論理」。<sup>11</sup> 這多少反映出，缺乏義理甚至根本「沒講道理」的舊思想，就會表現為不合條理、不合邏輯的舊話。也正是在新的表述中，孔子的權威、皇帝的權威和程朱的權威，都在學者的理性面前獲得了與此前

7 鄧章應：〈「文字學」術語的早期使用〉，《漢字漢語研究》2018年第1期，頁12–16。

8 注重發揮諸子義理，是劉師培本人的表述，參見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總序〉，收入劉師培撰，萬仕國整理：《儀徵劉申叔遺書》（揚州：廣陵書社，2014年），第4冊，頁1460。先行研究參李帆：《劉師培與中西學術：以其中西交融之學和學術史研究為核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74–75；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頁430–432；孫青：《晚清之「西政」東漸及本土回應》（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頁301–303。以上學者未刻意相互引用、對話，可算是面對原材料，不約而同地注意到了這一點。

9 大小新學之辨，可參見羅志田：〈能動與受動：道咸新學表現的轉折與「衝擊／反應」模式〉，《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1期，頁4–18。

10 新的學術分科還有相應語詞的引入，本身就致使政教大綱和新化之學問分開，參見章清：《會通中西：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基調及其變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尤其是引論和第三章的內容。

11 馬一浮：〈一佛之北米居留記〉，收入馬一浮著，吳光主編：《馬一浮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冊，頁47–52。需要注意的是，馬氏在辛亥前後深感國事無可措手，風氣濁惡難救，決定遠離輿論界。激發他最後公開發聲的正是報人王鍾麒（1880–1913），此人也是當年在揚州引劉師培入新學圈的先導之一，參見陳奇：《劉師培年譜長編》，頁42–43。

不同的估量。在青年劉師培筆下更具體的表現，就是論史談學不必宗經、人性不必內具五常等等。在清季仍主傳統儒學（如作為官學的程朱之學）的學者看來，這無疑是一種抽調了義理基礎的「尊古」。此種尊古，在性理、政理等重要方面都會使得儒學之價值讓位於新輸入的各種思想。<sup>12</sup> 劉氏此後持論的急遽趨新乃至虛無化走向，在《中國民約精義》等先行文本中的根脈，都可以由此得解。<sup>13</sup>

中西新舊學問的整體性在新潮中炸裂的劇變，只需要幾年就能發生在劉師培一個人身上。他並不是懷著這種預見在寫作《學術史序》，對話嚴復（1854–1921）、對話孔教論者、對話各位尚在樂觀比附中西思想的學人。劉書因此更像是一種動亂行將來臨之前的和諧，其中富有張力，但還不算是劇變之明兆。鑑於這部作品尚未獲得過整體性考察，且其中所涉及的與同代人之交流也少有論者注意，下文會對該組文本進行補充性研究。此後，將之置入清季民初趨新儒學的語境中，說明趨新儒學在辛亥革命前已面臨的思想困境。

## 二、以國故通新學

章學誠（1738–1801）有言：「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範於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sup>14</sup> 講的雖然是周代，但用來看盛清也未必不合。就《清儒學案》編者看來，在康熙（1654–1722）開啟的盛清之治時期，過往中國政教分立、學在於下的狀況有了很大改變。周代「上者則正誼明道以風化其下，下者則審端致力以扶

12 分見林麗月：〈劉師培的史學〉，《教學與研究》第1期（1979年），頁231–245；許滄：〈劉師培人性論之淵源及其現代轉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51期（2014年），頁1–50；陳壁生：〈兩種「六經皆禮」〉，《中國哲學史》2022年第2期，頁113–120。其實不光是陳所言之曹元弼（1867–1953），前面所提到的張爾田的宗經尊孔意識，也很值得跟劉氏比較研究。

13 楊貞德：〈從「完全之人」到「完全之平等」——劉師培的革命思想及其意涵〉，《臺大歷史學報》第44期（2009年），頁93–152。

14 章學誠：〈原道〉，收入倉修良主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01。

護其上」的理想幾於實現。<sup>15</sup> 反過來說，在帝王不再能用強大的個人理念統制、形塑朝野政教風貌時，個體士人學以淑世的意圖或能得到更大的自由施展空間。且夫學「問」重論理，學「術」重致用。非有開闊之致用空間，則學術斷難繁盛，這是《周末學術史序》的立場。該作開頭即對照西事，指出周代官學體制崩解，造就了和西方學術脫離教權、自由發展的類似盛況：

民間才智之士，各本其性之所近以自成一家言，雖純駁不同，要皆各是其所是。則學興於下之效也。<sup>16</sup>

以古證今可知：伴隨學術勃興而來者，是在下之民人與固有的「教」、「政」大權之輾轉周旋。《學術史序》一書此後的論述基點，也落在「純駁不同，各是其所是」上面。人從個體之具體經驗出發，平等地探索學問。在中歐學術發端之際，內心所驗、身外所接的事物，具有同等的研究重要性，所以古人皆「趨重實際，崇尚實行」。<sup>17</sup> 此後格致之學蹈虛不返，儒家不能無責：

古代學術以物理為始基。……儒家者流雖侈言格物，然即物窮理之實功，茫乎未之聞也（小字：孔子以道為本，以藝為末，故儒家雖有格物之空言，無格物之實效）。……格物窮理，兼擅其長。惜書籍失傳，而一二偽儒致以格物致知之學悉該于窮理之中，此科學所由日晦也（小字：近人喜以中國舊籍與西國科學書相證，如《格致古微》諸書是也。然附會之談，亦頗不免。未能妄為牽合

- 
- 15 徐世昌等編纂，沈芝盈、梁運華點校：《清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1。
- 16 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總序〉，收入劉師培撰，萬仕國整理：《儀徵劉申叔遺書》，第4冊，頁1459。又本文引述劉書，標點斷句根據個人理解確定，或與萬公之整理本有出入，冀讀者明察。
- 17 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心理學史序〉，收入劉師培撰，萬仕國整理：《儀徵劉申叔遺書》，第4冊，頁1461。

也)。能勿嘆哉！<sup>18</sup>

「一二偽儒」顯指奉《大學章句》之朱子學者，如果溯源的話，那麼《論語》已有的本末之論，也不失偏頗。保存不同個人面對實事物理本身的探索結果，此諸子學術所以可貴也。在諸子格致之學大多失傳以後，劉師培觀察當日學者反撥舊學格致頹波之努力，尤其是其中涉及周末學問義理的內容，<sup>19</sup> 判斷它們已難以重光古學之盛。故《學術史序》一書持崇古之名義，檢討諸子民主、徵實的寶貴義理，以端正近古風氣。其論倫理學比較《孟子》、《管子》有言：

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小字：即《孟子》所言，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則又由齊家之道推及社會國家（小字：西人講倫理學，於家族倫理後有社會倫理學，復有國家倫理學，所以明個人對社會國家之義務也），<sup>20</sup> 此倫理學發明之秩序也。……孟子以仁義禮智為四端（小字：則又謂倫理基於心理）。……《管子》重視四維，稍近儒術（小字：……又《管子》言少相居、長相游、祭祀相福、死喪相卹、居處相樂，為使人親睦之本。蓋以人人交相親愛，以保人羣之幸福，是為倫理之極則也。故《管子》頗雜儒書）。<sup>21</sup>

18 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理科學史序〉，收入劉師培撰，萬仕國整理：《儀徵劉申叔遺書》，第4冊，頁1495-1498。

19 他對於這些努力有很多保留，因為《格致古微》的作者，還有用《管子》論富強之術的學者（參見李欣然：〈中西異同視角下的「西學中源」說——兼論晚清「《格致古微》時代」的思想光譜〉，《文史哲》2020年第4期，頁116-128；李欣然：〈經世關懷下的晚清學術危機——何如璋《管子析疑》的思想史意義〉，《社會科學研究》2017年第6期，頁139-151），年齡上都大他很多。劉師培這個年紀，理應是非常激進，不同於這些同光新黨的人。但因為他出道太早、舊學很深，反而又沒有全然脫出前人語境。前面這些學者的著述，還會出現在《學術史序》當中。

20 此當看自梁啟超1902年出版的《新民說·論公德》，參見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8年），第二集，頁539-540。

21 整段引文可參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倫理學史序〉，收入劉師培撰，萬仕國整理：《儀徵劉申叔遺書》，第4冊，頁1463-1465。

細玩此論，明面上肯定儒家子學之社會倫理構想，然而卻強調以《管子》之學助成《孟子》之義。那麼沒有《管子》的幫助，《孟子》的倫理學是否會有甚麼缺憾呢？答案藏在這裡的「倫理基於心理」之中。〈論理學史序〉認為論理學探討的是心、事（物）相應的學問，而中國的《荀子》正名之學，就是我們今日學習西方新學的土壤。反之，《孟子》說理則「不合論理處尤多」，<sup>22</sup> 蓋因重心術而忽事實也。後之儒者或多不免於此，故研究事實，又往往不能覺察其後的一般規律：

美人葛通哥斯有言：「社會所始，在同類意識，倣擾於差別覽，制勝於模效性」。彖訓為分，是為差別；爻訓為倣，是為模效。故社會家言，其旨近於《大易》。<sup>23</sup> ……〈大聖〉之篇，其持論也必先驗小事小物以至於無限（小字：如先言中國九州，旁及瀛海九洲。今西人言社會學，非合世界全體研究之，則其說不成）。蓋陰陽家言執一理以推萬事、推顯而闡幽、由近而及遠、即小以該大，乃社會學之分析派<sup>24</sup> 也。……特道德家言多舍物而言理，陰陽家言復舍理而信數，此其所以遜西儒也。後世此學失傳，惟史學家言侈陳往跡、歷溯古初，稍近斯學。然治化進退之由來、民體合離之端委，徵之史冊，缺焉未聞。此則史官不明社會學之故也，可不嘆哉！<sup>25</sup>

劉師培此刻的西學知識，尚多源於梁啟超、章太炎的轉述。為找到這些知識片段在中國古代的同道，其論述風格也相當主觀化，不講

22 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論理學史序〉，收入劉師培撰，萬仕國整理：《儀徵劉申叔遺書》，第4冊，頁1468。

23 章太炎：〈《社會學》自序〉，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馬勇編訂：《章太炎全集·譯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頁45。此文作於1902年。

24 關於「社會學之分析派」，參見岸本能武太著，章太炎譯：《社會學》，收入上海人民出版社編，馬勇編訂：《章太炎全集·譯文集》，頁53-55。

25 整段引文可參見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社會學史序〉，收入劉師培撰，萬仕國整理：《儀徵劉申叔遺書》，第4冊，頁1469-1472。

所謂今古文門戶。此處引文甚至擬鄒衍推驗之法為西方社會學，僅取其博物廣知、分析事相的粗糙相似之處，其意無非在於尊崇周末之學以激勵今人接受西學——尤其是有關歷史演化的新知。在後來讀書人的眼中，此處對歷史學的獨特關切，引向了 James Harvey Robnson (1863–1936)《新史學》的介入。<sup>26</sup> 同樣在討論格致類學問的章節，《學術史序》極力表彰周儒對社會演化規律的認識，可以補充上述引文的判斷：

惟《大易》、《中庸》發明效實儲能之理（小字：斯賓塞爾《羣學肄言》曰：「一羣之中，有一事之效實，即有一事之儲能。方其效實儲能以消，而是效實者又為後日之儲能」。其理甚精。蓋儲能即翕以合質之說，效實即闢以出力之說也。<sup>27</sup> ……《中庸》又云：「君子之道費而隱。」鄭注以無道則隱之義稱之，非也。朱注云：「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用廣則近於效實，體微則近於儲能。宋儒言學，分體用為二，其理亦精。蓋《中庸》與《大易》本互相表裡，觀邵陽魏氏〈易庸通義〉可見<sup>28</sup>）。……《中庸》之論生物（小字：《中庸》曰：「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因材而篤，即天擇之義。其理與《論語》歲寒章相同，皆天演學之精言也），因庶物之繁滋而明天然淘汰之作用，孰非孔門之粹言乎（小字：以上二義皆孔子之言也）！蓋儒家富於經驗，故能執公例以定必然。……特儒家之意，以為世界遞遷，必有大同之一日。而大同之世，又非旦夕所可期。故懸一必然

26 參見劉咸忻：《文史通義識語》，收入劉伯毅等整理：《推十書：增補全本·甲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頁1057、1121。

27 所引譯文參斯賓塞（Herbert Spencer）著，嚴復譯：《群學肄言》，收入汪徵魯等主編：《嚴復全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3卷，頁13。劉師培愛用此論，在別處的使用參見劉師培：〈經學教科書第三十一課 論《易經》與哲學之關係三〉，收入劉師培撰，萬仕國整理：《儀徵劉申叔遺書》，第13冊，頁6095。

28 參見魏源：〈庸易通義〉，《古微堂外集》，收入《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校：《魏源全集》（長沙：嶽麓書社，2004年），第12冊，頁99–105。

之例而出以想像之詞（小字：猶列子之言華胥國，佛家之言淨土，耶教之言天國耳），豈可躐等而躋乎（小字：小康之世不可言大同，猶之亂世不可言昇平世也。所謂井蛙不可語海，夏蟲不可語冰也。以今日而欲行大同之法，非愚則誣）！近儒所言，未足識儒家立言之旨也（小字：近人多欲以大同之法施行於今日）。<sup>29</sup>

此論非但表彰周儒，連朱子、魏源（1794–1857）等近儒之學也加以肯定性之挪用。解說《中庸》進朱退鄭的取向就可能是受後者影響。由此可見，《學術史序》高視諸子、抨擊後儒的諸多論調（在上述引文的同一章裡就有）確實是實用需要驅動的產物，不代表劉師培有特定的進諸子、退儒家之固定門戶見。另一方面，也可說年輕的劉氏無甚定見。例如前面引文稱讚了鄒衍之說，旋即懷疑舍理而信數之陰陽家，是否能開出對接西學的徵實學問。此種游移，使《周末學術史序》不必真會厚古薄今、尊諸子抑孔學。<sup>30</sup> 劉氏之崇古固然伴隨很多反思近古學問陵遲、古義流失的議論，然近人如有一二與西學公理暗合者，<sup>31</sup> 亦不妨與周末諸子同列。「雖純駁不同，要皆各是其所是，則學興於下之效」，指的就是這種學風。上述引文所揭出的一條重要宗旨，是經驗事物發展的漸進性。效實儲能、富於經驗云云，都是在發明此旨——這也是劉師培此處引用的《群學肄言》卷首所述之義。<sup>32</sup> 這一看法貌似劍指「大同三世說」的言說者康有為

29 整段引文可參見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哲學史序〉，收入劉師培撰，萬仕國整理：《儀徵劉申叔遺書》，第4冊，頁1500–1502、1506。

30 實際上在《學術史序》中可見，儒家、術數家言雖然都是務虛，但怎麼都是前者更實在一些，後者導向的是虛、實混淆的窮途，參見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術數學史序〉，收入劉師培撰，萬仕國整理：《儀徵劉申叔遺書》，第4冊，頁1509–1510。

31 公理二字，在戊戌時期康梁一派的講學、寫作中頻頻出現，對此後十年的學界風氣有特定影響。例見孫寶瑄：〈《六齋有韻文集》序〉，收入胡珠生編：《宋恕集》（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1078–1079。此問題當專文研究，初步討論參見茅海建：《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尤其是下編各個單篇論文的相關部分。

32 嚴復：〈譯《羣學肄言》序〉，收入汪徵魯等主編：《嚴復全集》，第3卷，頁7。

(1858–1927)，然而康有為本人，尤其是在刻意規避「保中國不保大清」嫌疑的時候，同樣也有「亂世不可躡等升平世」的保守議論。<sup>33</sup> 所以很難確定引文末句是否就是要和康黨作對。幸運的是，〈學術史序·宗教學史序〉暗示了劉師培和時賢的主要矛盾所在：

上古之時，舍敬天明鬼而外，彼固無所為教也。又炎黃以前苗民立國於漢土，所奉之教雜糅人鬼，旁及詛盟（小字：近人錢塘夏氏引〈呂刑〉、〈楚語〉、《呂覽》以證苗民為多神教<sup>34</sup>）。中土聖王排斥苗教，目為巫風（小字：見〈商書·伊訓〉篇。是巫風為當時所禁），然根株未淨、延蔓匪難，故漢土遺黎復崇拜物多神之教，此亦古教之別派也。……（小字：近人多以中國為孔教，而南海康氏有保教之說，錢塘夏氏有攻教之說。不知孔子非特倡一教，乃沿襲古教者也）。<sup>35</sup>

人受制於天，學問跟宗教分離不開，是中國文化從古到今都未能剋服的缺點。這是多年沿襲，賢如孔子也未能超邁的傳統。劉師培坦承，惟有申包胥、荀子等少數古人明白「勝天」之理。<sup>36</sup> 在西方演化公理已然輸入的條件下，更不應該糾纏在「宗教」的葛藤之間。同樣是以國故通新學而利用，學者應該更多著眼於古人有關人之能動性的學說，攻教無謂，保教更不可取。孔子之教的當代意義，不在開山立教派，而在有教無類、開平民一線生機。這些思考，是劉師

33 參見茅海建：《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頁 144–215。反對躡等至於大同，跟批判現行君主制度，是可以並存的思想。研究者發現，同期劉師培在別處有對壘康學、批判君主的論述（陳奇：〈劉師培「力攻今文」析〉，收入氏著：《陳奇文集》〔北京：團結出版社，2017 年〕，頁 95–96），當然是對的，但不能抹煞他和康有為在此處的相似性。

34 此論應是化用而不是直引，參見夏曾佑：《最新中國教科書中國歷史》，收入楊琥編：《夏曾佑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頁 800。

35 整段引文可參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宗教學史序〉，收入劉師培撰，萬仕國整理：《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4 冊，頁 1474。

36 同上注，頁 1475。

培接觸了蔡元培（1868–1940）之後的收穫。<sup>37</sup>《學術史序》的崇古言說，寄託了徵實、重人的思想，故而導向了抗拒當時君主制度的更多議論，呈現出比前人更強的革新欲求。這些議論，同樣是在和時賢的對話中展開的。

### 三、在維新與革舊之間

〈學術史序·政法學史序〉的歷史觀念受到嚴譯政治學之形塑。<sup>38</sup>該部分文本湧動著一種強烈的革新欲求，時而又不同於嚴譯思想。其獨特之處，尤其在於對「論理」的使用：

蓋草昧之初，君主之任位有定年，與哲種共和政體同。君位既盈，必另舉賢者以代之。封禪者，即取禪讓之意者也，是為揖遜之天下。及圖騰社會易為宗法社會，遂為王者專制之先驅（小字：《社會通詮》曰：「宗法社會者，王者專制之先驅也。」）。……夫人君既操統治之權，無法律以為之限而徒欲責其愛民，是猶授刃與盜而欲其不殺人也，有是理哉？故儒家所言政法，不圓滿之政法學也（小字：不合論理）。<sup>39</sup>

引文省略號以前的部分，全順嚴譯《社會通詮》之意為之。文中所及嚴復論宗法演進於專制，跟儒家禮法羽翼君權兩點，此後的讀者熊十力（1885–1968）也表現出了非常類似的關注。熊也承認中國歷史上存在王者專制的黑暗時代，且諸多「儒學」資源被用來裝點

37 某君（蔡元培）：〈孔子生日紀念會演說辭〉，《政藝通報》1904年第18號，第37–39張。劉師培：〈讀某君孔子生日演說稿書後〉，《東方雜誌》1904年第11期，頁67–70。兩文原刊本年《警鐘日報》第226、227和229三期，參見前揭陳奇：〈劉師培「力攻今文」析〉，頁93。

38 孫宏雲：〈嚴復的政治學譯著及其學術意義〉，《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頁52–66。

39 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政法學史序〉，收入劉師培撰，萬仕國整理：《儀徵劉申叔遺書》，第4冊，頁1476–1478。

過這一專制，然而他指出儒經中的微言大義，有「消滅統治、廢私有制」者，嚴復等人失察而已。<sup>40</sup> 劉師培當然沒看出這樣深密的義理，不過他卻有一個意味深長的提問：「授刃與盜而欲其不殺人也，有是理哉？」這一提問，同樣帶有前人所未發的革新意味。結合前文所說，舊學在內容上的謬誤，會自然地反映為新式論理形式上的錯誤。儒家學說非但不能遏制君權，而且也不能真正恢張民權、發揮一個國家的能量。劉氏發展嚴譯西學，確實得出了這樣的思想，〈學術史序·計學史序〉據嚴學有言：

昔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小字：見〈祭法〉）。<sup>41</sup> 共財者，即均貧富之謂也。蓋皇古之初，以農立國，……，窮由於惰、富由於勤，此古代造字之微意也（小字：秦州陳競全亦主此說<sup>42</sup>）。……特西國計學家之言財政也，約析為三：一曰君主之私財，一曰國家之公財，一曰人民之私財。若三代之世，則誤認朝廷為國家。使君主之財，遂無限制<sup>43</sup>（小字：惟《周官》之制財用計於太宰，而帝王之財亦有會計，則分君主私財與國家公財為二）。……然大利所存，必有兩益，此則儒家所未知也（小字：蓋人生之初只有自營自私之念，無公共之觀念。及社會進化，知利物之正為利己，於是損一己之私益、圖一羣之公益，是利物之心正由利己之心而推也。而儒家則欲禁人民之言利，非強人民以所難乎）。……秦漢以降，儒家者流大抵主重

40 熊十力：〈附錄·六經是孔子晚年定論〉，收入氏著：《原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頁333-334。熊氏《原儒》等文字在清季趨新儒學語境中的位置，容專文討論。

41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卷五五，〈祭法第二十三〉，頁1803。

42 陳競全：〈讀說文雜記〉，《國粹學報》1905年第5期，頁四下至五上。劉師培認為陳氏小學有突過清人者。他很重視陳對文字意涵的闡發，亦在讀書筆記中抄錄了此處所涉古代造字之微意的雋語，參見劉師培撰，萬仕國整理：《儀徵劉申叔遺書》，第13冊，頁5704-5705。

43 斯密亞丹（Adam Smith）著，嚴復譯：《原富》，收入汪徵魯等主編：《嚴復全集》，第2卷，頁552。

農之論，而以加賦<sup>44</sup>為諱言（小字：亦由於君主以民財為一姓私產之故），而興利之臣則力主征商之說。二說紛爭，迄無定論。<sup>45</sup>

面對有限的古史文獻，近代士人做了很多想像發揮，偶然便會不謀而合。「窮由於惰、富由於勤」正是其一。此外，《禮記·祭法》原文意指山林川谷之所以是祭祀對象，是因為它們是君民共同倚之厚生的自然資源（共財）。劉師培將之闡發為以農立國的早期國家之公共財產，進而和後世專制君主國無限膨大的君主私產形成尖銳對照。因為無法在根源上認識限制君主財權的必要性，故後來儒家論計學要麼淪為強人所難，要麼就陷入無謂紛爭。其實人民謀利不僅應當，國家對擁有謀利自由、財產權利的人民徵稅也是正當的。此相輔相成者也，後儒多有忽略。另一方面，從軍事方面考察此缺陷，可知反對用兵正和反對加賦如出一轍，都是意識到出於「朝廷一己之私」的問題，但卻找不到一種承認民權、促使人民服務國家的路徑。《學術史序》對中國軍事問題的關注，誠有發揮嚴復《原富》相關按語之所未言者。<sup>46</sup>

能夠在國家財政理論上補足儒學之不足者，有上文所言之《周官》跟別處所言之《墨子》、《管子》，後者發行國債、徵稅礦山的意見尤切當時之要。<sup>47</sup>但是，這些學問似乎都不足以配合儒者的

44 同上注，頁 561–562。

45 整段引文可參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計學史序〉，收入劉師培撰，萬仕國整理：《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4 冊，頁 1483–1488。

46 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兵學史序〉，收入劉師培撰，萬仕國整理：《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4 冊，頁 1490。對比《原富》，收入汪徵魯等主編：《嚴復全集》，第 2 卷，頁 475–477。但是，後代儒家論兵事確無可取乎？確實一味主張保守乎？顯然不是。劉師培本人不久後在《國粹學報》上刊出的〈兩漢種族學發微論〉，就表達了不同的看法。該文認為漢儒提出的華夷之辨，無疑就是民族主義在軍事方面的正當表達。可以看到，一旦受到民族主義宣傳需要的影響，劉氏的文化學理分析其實很容易搖動，參見李帆：《「夷夏之辨」和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認同》（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20），頁 62–63。

47 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計學史序〉，收入劉師培撰，萬仕國整理：《儀徵劉申叔遺書》，第 4 冊，頁 1486–1487。

言說，在根本上改善日積月累下來的君民權分失調。<sup>48</sup>類似的現象也發生在了其他方面：「儒家者流，想像同文之盛，既以雅言宣之口。……及秦定天下，採儒家同文之說，罷黜天下之異文」，<sup>49</sup>古人製字精義由是不存；君主專制時代制定的法律不順人民情意，漢宋諸儒卻反而「尊君抑民且舞文弄法」，禮順人情之論在此亦無所施。<sup>50</sup>此皆政法學層面上之不圓滿有以致之，也非細事。反觀周代及之前所取得的科學、技術成就，因此而退化不見矣。

〈教育學史序〉稱言，周代的小學—鄉學—國學制度，已然同於西人的學制。不僅如此，就像分科的學問也存在於周末一般，分科分程教學的活動亦見諸《禮記》所載：

教授之法貴時習（小字：時習者，即學科有秩序之謂也。此實三代教育之舊法。蓋古代治學以時習為主，有就終身之時言者。如《禮記·內則》篇云：「六年，教之數與方名。九年，教之數日。十年，學書計，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二十，學禮、敦行孝悌。三十，博學無方。」以智育體育為先，以德育為後。<sup>51</sup>孰非古代教育之秩序乎！有就一歲之時言者，《禮·文王世子》篇有云：「凡教世子及教士，必時，春夏教干戈，秋冬教羽籥」，又云：「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此古人一歲中肄業之定則也。有就一日之時言者，即敬姜所謂「士朝而受業，晝而

48 以光宣時期為例，內務府、戶部權力分立，然無濟於前者屢屢向後者伸手的事實。待引入新式財政制度，明白算出皇室預算數目，政府又全然無法得出令社會輿論信服的數字，不過加速自身信用之破產，參見劉增合：〈家國之間：晚清皇室財政的逾界與管控〉，《中國歷史研究院集刊》第1輯（2020年），頁221-233。

49 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文字學史序〉，收入劉師培撰，萬仕國整理：《儀徵劉申叔遺書》，第4冊，頁1519-1520。

50 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法律學史序〉，收入劉師培撰，萬仕國整理：《儀徵劉申叔遺書》，第4冊，頁1535、1538-1540。此更可證明劉師培雖然根底漢學，但常常有漢宋雙遣的批判立場。

51 德育、體育、智育的劃分，當看自嚴復：〈原強〉，收入汪徵魯等主編：《嚴復全集》，第7卷，頁24-25。

講貫，夕而修覆，夜而記過無憾」是也。蓋古人教育皆有一定之程。孔子言「學而時習之」，即用古教法以勸弟子也。王注云：「誦習以時。」<sup>52</sup>其說甚確。）。<sup>53</sup>

這段引文是跟前文闡發共財之義同樣大膽的解說。算上結尾收官的王肅（195–256）《論語》注語，劉師培所用以重構古事者，全然是漢代儒家子書文獻。據此尚論宗周史事，還呈現出來可與同期夏曾佑著作相對照的經學痕跡。<sup>54</sup>另一方面，正如中國人種和外國種類有共通的源頭，中國文化的演進也遵循普遍的石器、鐵器時代規程。<sup>55</sup>劉氏特別推重周代文化，因周代乃是此普遍的人類文化在中國演進而至的巔峰。〈工藝學史〉是全書當中論述相對完整、一貫的部分，該篇以為：

上古工業，知勞力而忘窮理，以一人而兼萬能（小字：此由上古之世不知分功<sup>56</sup>之故）。草昧之風未盡革也。夏殷工學，歷久失傳。《周禮》一書，雖缺冬官，漢儒以《考工記》補其缺。今即記文考之，知周代之制有攻木、攻金、攻皮諸職，而刮靡、設色、搏埴亦設專官。及稽核〈曲禮〉，復有六工之名。蓋工掌於官，使民勛於業，不見異物而遷，故工列四民之一。且周代士民，洞明九數（小字：《說文》士字下云：「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一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為士」，此即古人重祿之徵。又

52 黎庶昌輯，何晏集解：《覆正平本論語集解》（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一上。

53 整段引文可參見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教育學史序〉，收入劉師培撰，萬仕國整理：《儀徵劉申叔遺書》，第4冊，頁1492–1493。

54 羅檢秋、徐鳳：〈經學潛流：夏曾佑、劉師培編纂歷史教科書的學源探析〉，《安徽史學》2021年第3期，頁72–79。用今天的話來講，劉師培《學術史序》屬於學術史，有心人或者能發現，它跟以往以人為中心學案體學術史很不一樣。然而這也不見得是劉氏在刻意更新學術史撰寫體例——竊以為這是劉氏在作文論學之際，不知不覺代入經學習慣的產物：以新學科分作為綱目，復以古書材料疏通證明之。

55 李帆：《劉師培與中西學術：以其中西交融之學和學術史研究為核心》，頁99–105。

56 分功（分工）和前面的計學一樣，都是《原富》使用的名詞。

祿字下云：「明視以算之，從二示」。《逸周書》曰：「士分民之祿，均分以祿之也」，與推十合一為士之例互相發明。蓋周代之時，無人不知數學。故九數列六藝之一。而〈內則〉又言：「六歲教數。」士者，發明數學之人也。仁和葉浩吾語予謂：「推十合一為士，即合十等之人，統治於君主也。」人有十等，使之統於一尊。<sup>57</sup> 而田自芸<sup>58</sup> 復語予曰：「倒干為士，此古人重武之徵。」證以《說文》，似皆未確），故良冶巧工，克以數學輔工學。……秦漢以降，士有學而工無學。卿士大夫高談性命，視工藝為無足重輕。此工學之精所由遜於哲種也，能勿嘆哉！<sup>59</sup>

由上述引文可知，周代不僅存在分科明晰的數理學問教育，而且存在對應的工業技術活動。葉瀚跟田其田二位，是劉師培在上海接觸的朋友——中間人很可能是當時參與發起中國教育會的蔡元培。他們告訴劉師培的話，暫未發見於其他存世文獻當中。<sup>60</sup> 二人的言論相比此處的論述，確實少於文獻證據和精巧之思。不過在今日看來，三位學者的闡釋也都不免於附會。而即便宗周文明確實如此發達過，其民勩於業、學問事業不相離的理想狀態也難以在日後復現。根據柳詒徵（1880–1956）的提示，可知最後一次依《周禮》復周

57 葉瀚（1861–1936）的生平見氏著：〈塊餘生自紀〉，《〈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輯（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頁476–491。最新的相關研究參見陸胤：《國文的創生：清季文學教育與知識衍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頁113–126。葉氏在1902年和蔡元培、吳稚暉等發起中國教育會，劉氏此處所記葉氏言語，蓋承戊戌餘波、反思君主制度之論。

58 田其田（1875–1924，估算）生平參見趙統：《南菁書院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頁516–517。

59 整段引文可參劉師培：〈周末學術史序·工藝學史序〉，收入劉師培撰，萬仕國整理：《儀徵劉申叔遺書》，第4冊，頁1532–1534。

60 田氏有單篇文章，和劉師培《學術史序》尤其文字學的部分思路接近，然未見其著作申論之，參見田北湖：〈說文砭許敘〉，《國粹學報》總第7期（1905年），頁八上至九下。

治的努力是在明初。<sup>61</sup> 但是這種基於乾綱獨斷的崇古改制，從結果來看是酷烈的，絕非好言民權的劉師培所樂見。<sup>62</sup> 舊學的維新，在這樣看來本身是個很難完成的任務。舊人追求新的學問要做到圓滿，就不得不和舊事物，尤其是君主制度做一了斷。

#### 四、綜評

劉師培在《國粹學報》成名的發表，大量地使用新名詞。觀其 1906 年的正名之論，發願十分宏偉：「爲惡、爲非者，均恃新名詞爲護身之具。……今也欲救其失，其惟定新名詞之界說，而別創新宗教乎！」<sup>63</sup> 惟此處所言宗教，結合上文所述，未必是敬天事神之宗教，而是指向眾人心地的公理之教。劉氏在 1907 年 6 月發表的一篇分析「賦」字字義的論文裡面說：

賦字從「武」從「貝」，後世因準備軍需之賦擴張之，凡民之納稅於政府者亦謂之賦，而君主遂因之病民。……後世以降，以君主爲富有四海也，由是思富之人，乃起帝王思想。然欲爲帝王必先得天下，欲得天下，不得不用兵。因個人爭富之故，至於殺人盈野、殺人盈城，曾不稍闕。……夫方趾圓顛，同爲人類。人類既同，即無軒輊於其間。豈世界之權利，專爲強者、富者所獨私乎？故弭爭端而破階級，莫若廢兵廢財。……顧此說推行，當先施之

61 柳詒徵：〈覆蒙文通書〉，收入柳詒徵著，楊共樂、張昭軍主編：《柳詒徵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年），第 12 卷，頁 158：「中國經制之學，只有《周禮》一書，如講制度，必從此出。不幸王莽一試而敗，王安石再試而敗，故程闕諸儒，雖極講制禮，而不敢專以《周禮》為號召。永嘉、金華諸儒，則不諱言之，其思想言論之結果，至明初復加小試」。

62 參見陳詩啟：〈明代的工匠制度〉，《歷史研究》1955 年第 6 期，頁 61-88。

63 劉師培：〈論新名詞輸入與民德墮落之關係〉，收入劉師培撰，萬仕國輯校：《劉申叔遺書補遺》（揚州：廣陵書社，2008 年），頁 457-458。1906 年 12 月 13 日出版。對劉師培正名理念所包含的理想主義要素之分析，可參見朱羽：〈劉師培「正名」思考的烏托邦瞬間〉，《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 年第 1 期，頁 15-28。

於中國。中國自三代以來以迄秦漢，其學術思想，均以弭兵抑商爲宗。……其所以不能廢兵者，則以專制之朝，君主必蓄兵以自衛；其所以不能廢財者，則以專制之國，君主必逞富以自私。<sup>64</sup>

這一理想如何實現？在該文末尾，劉師培說他所相信、認肯者，惟有「公理」。這是他當時的「宗教」。如前引論者所言，劉師培基於傳統思想所發展的激進革新論說，「一方面強調環境是決定人性善惡的關鍵因素，即傾向於環境決定論。另一方面，他又勸導人們修身自省，從而確保整體環境之良善，以泯除人性中不善的因子」。<sup>65</sup>這無疑是對外部環境的極高要求。這樣的要求，突出了善政公理和不善現狀（在中國，就是君主專制）之間的巨大張力，呼喚思者實踐政治變革。

經過前文的研究，或許可以更加篤定地講：劉師培使用新名詞以及渴望新政治的種子，潛伏在東渡之前、開始接觸新學時候的思考中間。在東渡之後，他使用新名詞的自信，甚至跟他之前嚴謹地使用新詞之主張有所衝突。<sup>66</sup>新潮發展之速，並不僅僅體現於劉師培一身，就在《學術史序》出版十年前，篤信程朱正學的浙江儒者朱一新（1846–1894），還旗幟鮮明地反對過開礦山、發國債之舉。<sup>67</sup>在劉氏眼中，這些不正是《管子》開給時下國人的濟時妙方乎？何可因其合於西來新法而反對之。甲午至於辛丑，在事和理的不同維度上，舊政舊教都再三受挫。士人引入新法新學的渴望不斷增長，也讓「民政」、「平等」之思發於私議。新潮高速烈化，重農、等差、

64 劉師培：〈廢兵廢財論〉，收入劉師培撰，萬仕國輯校：《劉申叔遺書補遺》，頁693–696。

65 許澍：〈劉師培人性論之淵源及其現代轉型〉，頁45。

66 章士釗（1881–1973）回憶稱：劉師培在日本時的議論「好引用日譯名詞，自詡通家」，而不避強不知為知的嫌疑。參見章士釗：《柳文指要》，收入章士釗撰，章含之、白吉庵編：《章士釗全集》（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年），第10卷，頁1446。

67 朱一新：〈無邪堂答問〉，收入《朱一新全集》整理小組整理：《朱一新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294–298。

性善等舊思想之柱石，在其間無所適從。<sup>68</sup>年輕的劉師培所迎上的，可謂是加速主義（accelerationism）概念發明之前的加速年代。

《學術史序》最後的〈文章學史序〉詳贍可讀，但卻專論藝文，且不涉演化史觀，跟全書風格有些不協調。有趣的是，這樣一篇格格不入的文字，呼應了劉師培十多年後在北京大學講文學、寫文學史講義的人生晚景。他以過人的精力跟學養在新潮當中激流勇進，最後證明是徒勞無功，不如及早回歸寧靜的學者生活。前文所稱和劉師培共有一位重要友人的馬一浮，便深明此理。王鍾麒算是劉師培從揚州到上海的引路人之一，也是馬一浮離開輿論場之前，最後「對話」和借用其名義（無生生）發表的人。<sup>69</sup>馬、王通信有言：

兩教并至，海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而在上者方自以黃、虞復出，因勢則據藜爲安，徼幸則負乘忘寇。此所謂福不盈眦、禍溢于世者也。游說者騰辯於飛箝，橫議者奮情於黨伐。匪惟賢者不入，亦中智所哀。尊兄抗志浮雲，不結世網，獨處隱約，可謂能安義矣。僕甚惟《大易》艮背行庭之指，老聃被褐懷玉之訓，良不欲以談說耀世。將洗心觀物，守其玄默，以味道真，雖糟糠不厭，庶幾遠于刑僇。<sup>70</sup>

信中所言在上者當指袁世凱（1859–1916），或者還包括有教育總長蔡元培，二者都是和劉師培有頗深因果的名人。馬一浮的處事態度，跟劉師培截然不同。這恐怕不能簡單地用「漢宋」區別來解

68 前述朱一新的思想，就包含有這些舊思想之柱石，此容專文討論。

69 馬一浮：〈致王仲麒〉，收入馬一浮著，吳光主編：《馬一浮全集》，第2冊，頁367–371；布樂德魯易（Loius Proal）著，馬一浮譯，于文博校注：〈政治罪惡論〉，《中國文化》第41期（2015年），頁276–297。

70 此部分內容為《馬一浮全集》本未收，參見〈馬一佛與王无生書二首〉，《甲寅》1914年第1冊第1號（1914年5月），收入章士釗主編：《甲寅雜誌·甲寅周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第1冊，頁155–156。馬氏此時的思想狀況，可參考余一泓：〈論馬一浮儒學思想之形成（1903–1939）〉，《臺大文史哲學報》第99期（2023年），頁147–181。

釋，因馬氏的遁世之舉雖然也有些激烈甚於常人，但跟亂局之中還敢「三變覓封侯」的劉師培相比，算是一般書生清高所致，無足為奇也。

在劉師培來滬後接觸或間接有關聯的浙江學人裡面，蔡元培、葉瀚在學人之外更是事務家，而章太炎、夏曾佑和張爾田的學人色彩更濃，也都有深厚的經史學功底和獨到的義理思考，赴日以後，章太炎同樣有過批判君主制度和儒家思想的激烈文字，復在此後「排遣名相」，通過周末以至明末諸子的學問，保守道德常識。<sup>71</sup>至於夏、張二人，都更早地表達過了對天演無情之怖畏，張氏之言曰：

夫典章法度所謂政也，孝親敬長所謂教也，孰可實用，孰可空言，必有能辨之者。……天下有敢於更張周古典章法度之人，必無敢於滅裂孔子名教之人。……章實齋先生書博學詳說，余所服膺，惟斯言則害於道，由其知史而不知經也。<sup>72</sup>

張爾田老來讀到《劉申叔遺書》中論古代政、學和宗教關係的內容，微覺不夠圓滿，因其專主古文經說、「不承認孔子為教主」也。<sup>73</sup>劉師培希望看到的宗教或在人類演化長路的天際之外，而教主的榮耀，可能就留給了每一個「完全的人」。作為人類演化的一部分，中國會走到那一刻，甚至還可能憑藉卓特的歷史文化率先到達（廢兵廢財當先施之於中國）。鑑於鋪成這條長路的基石是對公理的信心，是每個人邁向完全善好的信念，劉師培的政治批評無論如何激烈，其具體的政治願景又是十分混沌、多變，乃至空虛的。<sup>74</sup>

71 此當專文研究。

72 張爾田：《史微》，收入孫文閣、張笑川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張爾田、柳詒徵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166-167。夏曾佑的言論見〈論中國前途當用何種宗教〉，收入楊琥編：《夏曾佑集》，頁336-338。

73 張爾田：《歷史五講》，收入孫文閣、張笑川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張爾田、柳詒徵卷》，頁220-221。

74 楊貞德：〈從「完全之人」到「完全之平等」——劉師培的革命思想及其意涵〉，頁135-144。

近人劉師培以博通四部舊學、持論有本著稱，也有趨新求異、好名無恆之公共形象。他在 1905 年於《國粹學報》刊出的「少作」《周末學術史序》雖內容豐富，然尚未獲得專門的整體性考察。本文意識到，外在的激烈新潮以及劉師培本人過低的年紀、「過多」的學識，讓《學術史序》成為了清季舊學跟新知識發生化合作用的重要案例。<sup>75</sup>由此，本文考察了這一系列文本的整體理路，探索其中吸收新學（以嚴譯為主）、對話同類新派士人（以浙人為多）的種種痕跡。經過這些研究以及適當的對比觀察，此文發現《學術史序》可謂是當時趨新儒學的一種高潮，其政治上之激烈君主批判、舊學上之深厚文獻積累、中西比附上之精巧迂迴，<sup>76</sup>都能作為此種高潮的指標來看待。後來劉氏寫作支持復辟之〈君政復古論〉，和此前的宗周之思是否有關聯？難以實證。在這位天才學者於清季出版的眾多相關著述當中，趨新的潮音聲響如雷，或有其他痕跡可供考求。受篇幅、學力所限，此處難以深入，當俟之後日。<sup>77</sup>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高潮同時又呈現出日暮夕照之相，因為其中所表達的「新化」外界之實踐訴求，已非文人學士可以擔荷，疏

75 此後，劉師培新舊結合之學在外人眼中的進境，不妨更引錢玄同之語以明之：「購得《新世紀》五至八號，於晚間臥被中觀之，覺所言破壞一切，頗具卓識，惟終以學識太淺，而東方之學尤所未悉，故總有不衷於事實之處，較之《天義》，瞠乎後矣（此由《天義報》中如 Liu Kuang Han 君諸人中國學問深邃之故）。而要之大輅椎輪，於現今黑暗世界中不得謂非一線之光明也」。參見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106。記於 1907 年。

76 李貴生就指出，章太炎、劉師培二位雖然以古文家見稱，但是他們徵實的學風也是相對於致用應時的所謂今文學風而言。如果跟後起之實證史學作比較，那麼二叔之學仍然不屬於聯證分析的新式文史之學。他們還是像經師依教解經那樣，懸有特定預設地解釋、疏通文本。例如從現代史學的角度看，申叔《中國民約精義》中存在大量的過度發揮、疏證，其問題正在於上述古今之別，參見李貴生：《疏證與析證：清末民初中國文學研究的範式轉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 年），頁 38-47。本文的研究，佐證了李生之論。

77 承蒙一位學術先進提示：劉氏個人長期基於「崇古」理念而對「理想傳統」（政與學）的論述建構，以及此一建構的思想與政治意涵，還可以在《中國民約精義》與《古政原始論》、《古政原論》等關鍵文本中找到更多。雖然如此，竊以為《中國民約精義》先行研究已有充分利用，後面兩《論》言政多於言學，或不必要如本文研究《學術史序》一般考究。書之於此，供讀者參詳。

通國故之舉本身的價值也在比附、演變中消解無餘。<sup>78</sup> 不過，這並不是劉氏當時有閒暇可以計較的問題。學人逢「周末」亂世，惟以「周公不處仲尼需」自遣也。<sup>79</sup>

---

78 施耐德 (Axel Schneider) 著，關山、李貌華譯：〈世界歷史與歷史相對主義的問題——1919年後梁啟超的史學〉，收入氏著：《真理與歷史：傅斯年、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民族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頁258-259。

79 馬一浮：〈雨（其一）〉，收入馬一浮著，吳光主編：《馬一浮全集》，第3冊，頁183：「好風微雨每相俱，破塊鳴條亦並趨。何恨漂搖兼道路，周公不處仲尼需」。

## 引用書目

-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馬勇編訂：《章太炎全集·譯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
- 左玉河：《從四部之學到七科之學：學術分科與近代中國知識系統之創建》。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
- 布樂德魯易（Loius Proal）著，馬一浮譯，于文博校注：〈政治罪惡論〉。《中國文化》第41期（2015年），頁276–297。
- 田北湖：〈說文砭許敘〉。《國粹學報》1905年第7期，頁8–10。
- 《朱一新全集》整理小組整理：《朱一新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 朱羽：〈劉師培「正名」思考的烏托邦瞬間〉。《杭州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頁15–28。
- 余一泓：〈論馬一浮儒學思想之形成（1903–1939）〉。《臺大文史哲學報》第99期（2023年），頁147–181。
- 李帆：《劉師培與中西學術：以其中西交融之學和學術史研究為核心》。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
- ：《「夷夏之辨」和近代中國的民族國家認同》。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
- 李孝遷：〈《周末學術史序》：中國第一部以「學術史」命名的著作〉。《華夏文化》2001年第3期，頁49–51。
- 李欣然：〈經世關懷下的晚清學術危機——何如璋《管子析疑》的思想史意義〉。《社會科學研究》2017年第6期，頁139–151。
- ：〈中西異同視角下的「西學中源」說——兼論晚清「《格致古微》時代」的思想光譜〉。《文史哲》2020年第4期，頁116–128。
- 李貴生：《疏證與析證：清末民初中國文學研究的範式轉移》。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
- 汪徵魯、方寶川、馬勇主編，汪徵魯、陳旭東、方挺點校：《嚴復全

- 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
- 林麗月：〈劉師培的史學〉。《教學與研究》第1期（1979年），頁232-245。
- 施耐德（Axel Schneider）著，關山、李貌華譯：《真理與歷史：傅斯年、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民族認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
- 柳詒徵著，楊共樂、張昭軍編：《柳詒徵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
- 胡適：“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gical Method in Ancient China”。收入季羨林主編：《胡適全集》，第35卷，頁298-60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 茅海建：《戊戌時期康有為、梁啟超的思想》。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1年。
- 倉修良主編：《文史通義新編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 孫文閣、張笑川編：《中國近代思想家文庫·張爾田、柳詒徵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4年。
- 孫宏雲：〈嚴復的政治學譯著及其學術意義〉。《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5期，頁52-66。
- 孫青：《晚清之「西政」東漸及本土回應》。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9年。
- 孫寶瑄：〈《六齋有韻文集》序〉。收入胡珠生整理：《宋恕集》，頁1078-1079。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徐世昌等編纂，沈芝盈、梁運華點校：《清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
- 馬一浮著，吳光主編：《馬一浮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 張仲民：〈「以學殉時」：洪憲帝制期間的劉師培〉。《史林》2019年第2期，頁100-114。
- 梁啟超著，湯志鈞、湯仁澤編：《梁啟超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

- 學出版社，2018年。
- 章士釗主編：《甲寅雜誌·甲寅周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年。
- 章士釗撰，章含之、白吉庵編：《章士釗全集》。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年。
- 章清：《會通中西：近代中國知識轉型的基調及其變奏》。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年。
- 許滄：〈劉師培人性論之淵源及其現代轉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51期（2014年），頁1-50。
- 陳奇：《劉師培年譜長編》。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7年。
- ：《陳奇文集》。北京：團結出版社，2017年。
- 陳詩啟：〈明代的工匠制度〉。《歷史研究》1955年第6期，頁61-88。
- 陳壁生：〈兩種「六經皆禮」〉。《中國哲學史》2022年第2期，頁113-120。
- 陳競全：〈讀說文雜記〉。《國粹學報》1905年第5期，頁4-5。
- 陸胤：《國文的創生：清季文學教育與知識衍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2年。
- 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
- 楊貞德：〈從「完全之人」到「完全之平等」——劉師培的革命思想及其意涵〉。《臺大歷史學報》第44期（2009年），頁93-152。
- 楊琥編：《夏曾佑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楊麗娟：〈揚州新見劉師培早期生平史料考略——以劉葆儒《三叔廿歲前「形勢」》一文為考察中心〉。《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3期，頁77-83。
- 葉國良：〈劉師培《禮經舊說》的寫作宗旨及其詮釋上的問題〉。《臺大中文學報》第31期（2009年），頁247-268。
- 葉瀚：〈塊餘生自紀〉。收入《〈中國文化〉研究集刊》第五輯，頁476-491。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87年。

- 熊十力：《原儒》。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
- 趙統：《南菁書院志》。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5年。
- 劉咸炘撰，劉伯毅等整理：《推十書：增補全本·甲輯》。上海：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9年。
- 劉師培：〈讀某君孔子生日演說稿書後〉。《東方雜誌》1904年第11期，頁67-70。
- 劉師培撰，萬仕國輯校：《劉申叔遺書補遺》。揚州：廣陵書社，2008年。
- 劉師培撰，萬仕國整理：《儀徵劉申叔遺書》。揚州：廣陵書社，2014年。
- 劉增合：〈家國之間：晚清皇室財政的逾界與管控〉。《中國歷史研究院集刊》第1輯（2020年），頁175-234。
- 蔡元培：〈孔子生日紀念會演說辭〉。《政藝通報》1904年第18號，第37-39張。
- 鄧章應：〈「文字學」術語的早期使用〉。《漢字漢語研究》2018年第1期，頁12-16。
- 鄭玄注，孔穎達正義：《禮記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 黎庶昌輯，何晏集解：《覆正平本論語集解》。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
- 錢玄同著，劉思源主編：《錢玄同文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 《魏源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校：《魏源全集》。長沙：嶽麓書社，2004年。
- 羅志田：〈能動與受動：道咸新學表現的轉折與「衝擊／反應」模式〉。《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1期，頁4-18。
- 羅檢秋、徐鳳：〈經學潛流：夏曾佑、劉師培編纂歷史教科書的學源探析〉。《安徽史學》2021年第3期，頁72-79。

## Restoration, Reformation, Revolution: On Liu Shipei's (1884–1919) *Preface to the History of Learning in the Late Zhou* 周末學術史序

YU Yi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Hainan University

Liu Shipei 劉師培, a distinguished traditional scholar active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and early modern China, is noted for his knowledge in Chinese traditions, as well as for being a radical reformer and a capricious person. Liu's *Preface to the History of Learning in the Late Zhou* (*Zhou mo xueshushi xu* 周末學術史序) was seen as ground-breaking in that it reflects the convergence of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and new knowledge introduced from Japan and Europe at that time.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ideological underpinnings of the book related to Liu's attitudes towards truth, democracy, and antiquity, revealing an underlying, coherent logic that is not explicitly stated within his work. The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viewpoints of contemporary scholars and the new interpretations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that emerged with this book, exploring the specific context in which Liu expressed his desire to blend reformation with traditionalism. Since Liu's own thought and external trends rapidly evolved and diverged in the years following, this essay also analyzes Liu's later statements and contrasts them with other scholars' views in order to highlight the dilemma Liu faced in his attempt to navigate old and new perspectives. This essay concludes that Liu's book represents one of the last high points of the so-called "New Learning" trend during the late Qing era.

**Keywords:** "New Learning" in Late Qing, Liu Shipei, Study of Pre-Qin Schools, Cultural Conservatives